



杜一白 /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鲁迅研究史稿



杜一白 著
辽宁大学出版社

鲁迅研究史稿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迅研究史稿/杜一白著.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00.4

ISBN 7-5610-3969-7

I. 鲁… II. 杜… III. ①鲁迅著作-研究②鲁迅
(1881~1936)-人物研究 IV. I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2849 号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 110036)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200 千字 印张: 8.25 插页: 2

印数: 1—1000 册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200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蒋秀英

责任校对: 朱 娜

封面设计: 刘桂湘

版式设计: 贾 莉

定价: 18.00 元

前 记

多年来,我在给本校中文系同学开设“鲁迅研究”专题课时,总是将有关鲁迅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作为这门课的第一讲。起初讲得较为简括。以后年复一年开课,不断增补新的内容,讲义也愈积愈多。1985年,我系开办现代文学助教进修班,我给这个班讲授“鲁迅研究”课时,几乎用了一多半的时间来讲述这方面的内容,基本上形成了一门“鲁迅研究史”课的雏形。后来经一再修改、补充,逐渐把它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列入了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的教学计划。

作为一部较为成型的书稿,本书是1988年至1989年最后修订完成的。因此它的时间下限断在1986年底。这样,1987年以后鲁迅研究状况就未能写入,这是颇令人引以为憾的。更为遗憾的是,在众所周知的学术著作出版难的情况下,书稿迟迟不能付梓面世,而且一搁置竟然就是10年之久!其间虽有几家出版社曾拟或已列入出版计划,有的甚至嘱我写好了后记,但最后均因涉及经费问题而终致搁浅。它的经历,比我此前所出版的几本书要艰难曲折得多。每念及此,常使我感慨良深。所幸的是:第一,本书稿中一些可以独立成篇的章节,曾得以以论文形式陆续在多家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有的并被中国人大书报资料社复印转载,使其产生过一定的社会影响;第二,许多朋友特别是辽大出版社编审蒋秀

1576/08

英同志一直在真诚地关心着本书的出版问题。经过秀英同志的多方奔走,在学校和出版社有关领导的积极支持下,今天终于使本书能以完整的面貌与读者见面。为此,我要在这里对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之忱!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曾从鲁研界一些同行的有关文字中受到许多启迪和教益,在此也一应表示我的谢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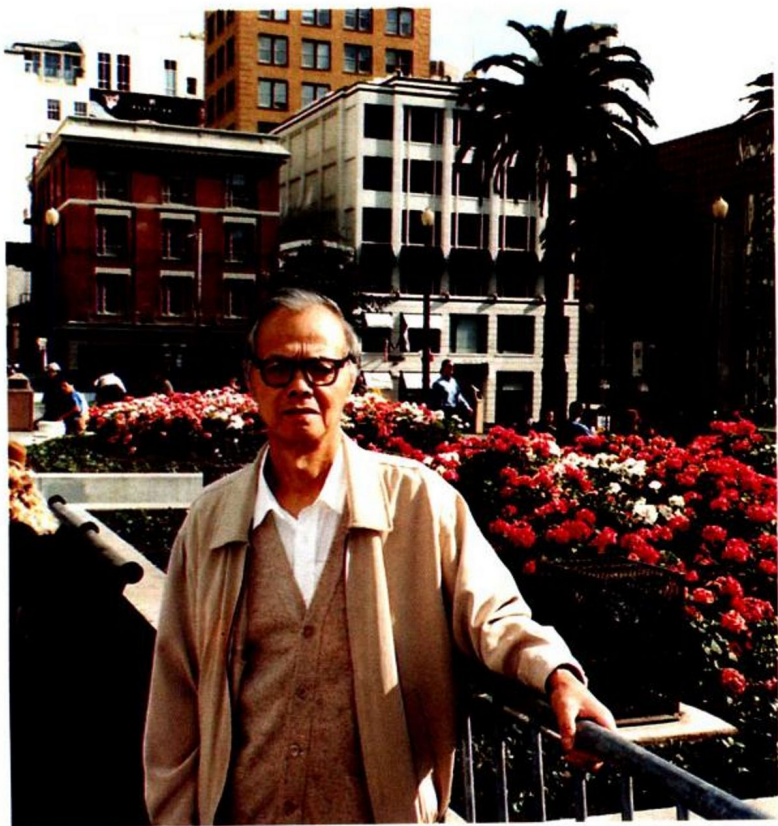
关于本书的写作旨趣及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导言”中已经述及,兹不赘。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为尽量控制全书规模以利出版,各个时期的综述部分都写得比较简约,在论及一些重要的鲁研著作的时候,也未予充分展开,详加剖析。而对重要鲁迅研究家的专节评介,也没有将当代一些卓有成就的中年学者包括进去。这除了控制全书字数外,还由于考虑到这些作者的鲁研事业风头正健,还尚处于“进行时”。相信经过一段历史的沉淀期以后,他们的业绩与贡献,定会在有关史书中得到集中的总结和科学的评价。

我自惭这是一本未能尽如人意之作,而眼下又去国在即,已不及再细加斟酌、打磨,只好就此推出并诚惶诚恐地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正了。

杜一白

1999年6月2日

于辽宁大学



作者简介

杜一白 原名杜毅伯，湖北黄陂人，1933年生。1958年武汉大学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毕业。辽宁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鲁迅学会理事，辽宁鲁迅学会会长。出版自撰及合写的专著、教材《鲁迅思想论纲》、《鲁迅的写作艺术》等12种，发表论文、评论150余篇。著述多次获奖。被评为辽宁大学优秀研究生导师，沈阳市优秀教师，获国务院颁发的享受政府特殊津贴证书。入编《中国文学大辞典》、《剑桥世界名人录》等多种辞书。

目 录

导 言	(1)
第一章 早期的鲁迅研究	(5)
第一节 最初出现的鲁迅作品评论	(5)
第二节 沈雁冰的鲁迅研究	(7)
第三节 冯雪峰的鲁迅研究(上)	(13)
第四节 瞿秋白的鲁迅研究	(17)
第五节 本时期其他重要的鲁迅研究论著	(22)
第六节 本时期鲁迅研究领域里的斗争	(27)
第二章 鲁迅研究的深入发展时期	(31)
第一节 本时期的重要鲁迅研究专著概观	(31)
第二节 本时期的重要鲁迅研究论文一瞥	(41)
第三节 党中对鲁迅的崇高评价	(55)
第四节 毛泽东、周恩来对鲁迅的评论	(56)
第五节 胡风、周扬的鲁迅研究	(61)
第六节 鲁迅研究继续在斗争中前进	(70)

第三章 建国后“十七年”的鲁迅研究 (74)

- 第一节 本时期的重要鲁迅研究论著 (74)
- 第二节 冯雪峰的鲁迅研究(下) (91)
- 第三节 唐弢的鲁迅研究 (98)
- 第四节 陈涌的鲁迅研究 (107)
- 第五节 王士菁的鲁迅研究 (115)
- 第六节 本时期鲁迅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庸俗社会学
倾向和“左”的干扰 (121)

第四章 十年动乱时期的鲁迅研究 (123)

- 第一节 鲁迅研究的大曲折、大倒退 (123)
- 第二节 若干收获 (126)
- 第三节 李何林的鲁迅研究 (128)

第五章 新时期以来的鲁迅研究 (135)

- 第一节 基本成就及主要鲁迅研究论著述评 (135)
- 第二节 新时期鲁迅研究的若干特点 (222)
- 第三节 鲁迅研究史上的空前盛会
——全国纪念鲁迅诞生 100 周年学术讨
论会的召开 (232)
- 第四节 港台鲁迅研究掠影 (242)
- 第五节 王瑶的鲁迅研究 (248)
- 第六节 总结与展望 (254)

导 言

鲁迅不仅无愧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而且被学术界认作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与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卢梭、歌德、拜伦、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高尔基等文坛巨擘同享盛誉。人们对于鲁迅的巨大意义远非今天才开始认识到。早在 1936 年鲁迅逝世后不久，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斯诺就将他称为“现代中国文坛一个最重要的人物”，预言“不久鲁迅的名字将广为人知，并成为当代世界上最具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且将他与苏俄的高尔基、法国革命时期的伏尔泰以及罗曼·罗兰等人相比拟（见《中国的伏尔泰》，载 1982 年 2 月 14 日《光明日报》）。一位异国的文化人在当时就有如此的眼力，是极为难得的。确实，鲁迅是我们民族的伟大代表，又是一个时代的伟大代表。他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是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的。毛泽东认为他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是空前的民族英雄，并强调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国新文化的方向。毛泽东对鲁迅的评价之高，可以说在历史人物中是罕见的。鲁迅不愧为“民族魂”，不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

正由于鲁迅的出现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桩大事，一个奇迹，所以几乎从鲁迅登上新文坛之日起就有了鲁迅研究。将近 70 年来，尽管风云变幻，道路曲折，鲁迅研究却始终在延续着和发展着。有关鲁迅研究的论著（包括论文、专著、资料、工具书等等）层出不穷，汗牛充栋，不可胜数。这在整个中国作家研究中是极为罕见

的。令人信服的事实表明:鲁迅及其文化遗产是一座巨大的精神宝库,犹如磁石般吸引着一代又一代学人,在学术领域,鲁迅研究已如同《红楼梦》研究一样处于突出重要的地位,以至被人称作当代的两大显学。一位美学家说得好:“不懂鲁迅,就不懂中国,他的作品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只有两部散文文学堪称百看不厌,这就是《红楼梦》和鲁迅文集”(李泽厚:《略论鲁迅思想的发展》,载《鲁迅研究集刊》第1辑)。重要的是,由于鲁迅非凡的贡献和地位所决定,鲁迅研究已不仅仅是单纯的、一般的作家研究,而是要通过这面时代和民族的镜子,去更加深刻地认识中华民族这个伟大的整体,去透视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总面貌。随着鲁迅研究的深入发展,人们已越来越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今天,鲁迅研究正经历着它的高度成熟期。人们对鲁迅研究的目的、意义、内容、方法等问题的认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明晰和深入。目前,国内已有多处专门的鲁迅研究机构,鲁迅研究队伍(包括专业的和业余的研究者)正在不断壮大。鲁迅研究,事实上已经成为一门独立的、自成体系的学科,即“鲁迅学”。

为了总结经验教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更好地推进今后的鲁迅研究工作的发展,我们很有必要在这里回顾一下70年来鲁迅研究所走过的历史道路。这个回顾尽管是相当简略的,但却力求能较为准确地勾勒出它的基本轮廓。为此,历史唯物主义将是本书作者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对各种有关问题的考察决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要本着客观公正的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去对待评论对象,尽最大的努力反映出事物的本来面貌。点、面结合则是本书作者所要贯彻的另一原则。这就是说,既要尽可能地反映出几十年来鲁迅研究历史的总体面貌,又要突出那些有重要贡献的鲁迅研究家或有重要学术价值的鲁迅研究专著。自然,以上都只能是相对而言。因为即使再全面也难免挂一漏万,而该突出却未能真正突出者或许亦不能免,更何况突出与深入也难以完全画上等号。本书还力求贯彻史、论结合的原则,既注意有关

资料的梳理和介绍,又注意进行理论的分析 and 概括,从中总结出某些规律性的东西,以使本书既非单纯的史料的堆砌和罗列,又非脱离具体史实的发空论、放空炮。然而人生常有憾事,笔者的意图与本书的实际面貌定然存在不小的距离,这就只有请读者和专家严格批评、教正了。

第一章 早期的鲁迅研究

第一节 最初出现的鲁迅作品评论

从1919年至1936年10月鲁迅逝世为止,可以说是鲁迅研究的早期。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不朽的奠基之作。最早出现的影响较大的评论鲁迅作品的文章,通常被认为是吴虞在读了《狂人日记》以后所写的《吃人与礼教》一文。它刊载于1919年1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6卷6号。该文虽然不是一篇纯文学批评的文章,而只是借题发挥之作,但其意义却不可低估。文章说:“我觉得他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伪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文中还列举了不少事实,说明“一部历史里面,讲道德说仁义的人,时机一到,他就直接间接的都会吃起人肉来了。”吴虞的这些话,无疑是抓住了《狂人日记》的要领的。他的发挥,也触及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实质。这说明,这个思想敏锐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活跃人物,乃是我国新文学史上正确认识、评论鲁迅作品的第一个人。

时隔不久,在上海的报纸上也出现了涉及《狂人日记》的文字。

1920年2月27日《申报》副刊《自由谈》的《小说特刊》专栏里,刊登了署名“风兮”的一篇文章:《我国现在创作之小说》。该文认为当时文坛上的创作有两种,一为体例之创作,即只是袭用了章回小说、四六小说、笔记小说等旧的形式,并没有表现什么新的内容,而只有志意之创作,在思想内容上提供了新的东西,才够得上是新的文学作品。作者接着写道:“鲁迅先生《狂人日记》一篇,描写中国礼教好行其吃人的德,发千载之覆,洗生民之冤。此篇殆真为志意之创作小说,置之世界诸大小说家中,当无异议。在我国,则唯一无二矣!”可以看出,作者对于《狂人日记》的不同凡响的意义和价值,是认识得相当清楚的。这在当时来说,实属难能可贵。以上情况表明: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的思想文化界,对于《狂人日记》的认识和评价都是一致的。这也正是这篇小说本身所具有的伟大价值的一个有力的佐证。

也有研究者发现还有一些比上述两文更早的文字。如:1919年2月出版的《新潮》第1卷第2号的《书报介绍》栏,署名“记者”的在介绍《新青年》时就曾涉及《狂人日记》。作者写道:“唐俟君的《狂人日记》用写实笔法,达寄托的(Symbolism)旨趣,诚然是中国近来第一篇好小说。”同年4月出版的《新潮》第1卷第4号上,又刊出了孟真(即傅斯年)的《一段疯话》,文中写道:“鲁迅先生所作《狂人日记》的狂人,对于人世间的见解,真个透彻极了;但是世人总不能不说他是狂人。哼哼!狂人,狂人!耶稣、苏格拉底在古代,托尔斯泰、尼采在近代,世人何尝不称他做狂人呢?”这两位作者对《狂人日记》的艺术特色和狂人形象的实质所持的见解,无疑是显示了一定的眼力的。同年9月25日,北京《国民公报》的小杂感专栏《寸铁》也刊登了一则短文,署名“狂人”。作者说,他刚读到《狂人日记》时,“以为中国虽不甚开化,然而人吃人的事也未必还有。这位鲁君的文章,未免有些过火了”。后来他又在报纸上读到一篇恶毒诅咒“五四”爱国青年的文章,该文作者有一次在正阳楼大嚼螃蟹,忽然奇想联翩,居然把爱国青年诬蔑为横行无忌的螃

蟹，“恨不能尽持而为吾嚼也”。“狂人”读罢该文后感慨万端地写道：“我看了这段话，才知道鲁君所说尚未能尽。他的小说里，是说许多人想吃一个人。现在竟有一个人(?)想吃尽爱国少年了。呵呀！我也要做‘狂人’了！”(方文：《“狂人”评〈狂人日记〉》，载《鲁迅研究资料》第14辑)此文对《狂人日记》的思想内容有所引申，作者的倾向也很鲜明。不过，由于吴虞当时名气很大，被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英雄”，他的见解犀利的文章又系刊登在风靡一时的《新青年》上，因此，论社会影响，乃是上述作者的文章所远远不及的。但他们的文章毕竟又共同说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鲁迅的白话小说以其思想的深刻和格式的特别，是一出现于新文坛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的。这种情况，在当时还难以找到第二个人。

当然，本时期影响最大的鲁迅研究者既非吴虞，更非“凤兮”及其他诸位，而是沈雁冰(茅盾)、冯雪峰和瞿秋白。

第二节 沈雁冰的鲁迅研究

沈雁冰虽然以小说名世，但他最初却是以从事评论工作而步入人文坛的。他当时所写的有关鲁迅及其作品的一些评论文章，角度新颖，见解独到，在早期鲁迅研究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他本人也因此而被誉为“鲁迅最早的知音”。

早在1921年，沈雁冰就在《评四五六月的创作》(载《小说月报》第12卷第8号，署名“郎损”)一文中充分肯定了鲁迅的小说《风波》，说它“把农民生活的全体做创作的背景，把他们的思想强烈地表现出来”，这样的作品“在这三个月里是寻不出了”。因为在当时，一般的作者更加热衷的是知识分子和城市市民生活方面的题材，真正关注农民的作者是极为少见的。沈雁冰还表示：在过去的三个月中的创作，他最佩服的是鲁迅的《故乡》。他独具己见地认为小说的“中心思想是悲哀那人与人中间的不了解，隔膜。造成这不了解的原因是历史遗传的阶级观念”。同时又正确指出“作者

对于将来却不曾绝望”。1922年初,当《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上连载到第4章时,沈雁冰就以其敏锐的艺术感受肯定它“实是一部杰作”。他说:“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还由此想起了俄国作家冈察洛夫笔下的奥勃洛摩夫来(《致××信》,载《小说月报》第13卷第1号)。这说明,沈雁冰已经初步察觉出阿Q这一形象的巨大的典型意义,感到了他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沈雁冰在当时就能将阿Q与世界文学史上著名的艺术典型相比并,这种慧眼尤为难得。1923年8月,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出版。10月间,沈雁冰就写了《读〈呐喊〉》一文(载1923年10月8日《时事新报》副刊《文学》第91期),肯定了这些作品“都是旧中国的灰色人生的写照”,具有高度的真实性;同时强调《狂人日记》猛烈攻击传统的旧礼教,充满“离经叛道”的思想,其题目、体裁、风格也均“新奇可怪”,有所创新,是“前无古人的文艺作品”;《阿Q正传》则“写出了人性的普遍弱点”,“给读者以难磨灭的印象”,并且为辛亥革命作了“极忠实的写照”。文章还进一步极为中肯地指出:“在中国新文坛上,鲁迅君常常是创造‘新形式’的先锋;《呐喊》里的十多篇小说几乎一篇有一篇新形式,而这些新形式又莫不给青年作者以极大的影响。”总之,沈雁冰对《呐喊》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及其贡献、地位和影响的论析,都是相当精当的,充分显示了作者高人一等的认识水平和艺术鉴赏力。到了1927年,沈雁冰又写了全面论述鲁迅的长文《鲁迅论》(载该年11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8卷第11号)。文章充分肯定了张定璜在《鲁迅先生》中认为鲁迅的小说“乃是舟子在人生的航海里饱尝了忧患之后的叹息”的评断,充分肯定了他对鲁迅小说现实主义特色的分析,十分称道张文的“三个冷静”说、“沉默的旁观”和“老实不客气的剥脱”等见解,并且进而指出:鲁迅不仅不客气地“剥脱”别人,同时也不客气地“剥脱”他自己,如在《一件小事》、《端午节》中解剖自我的严肃和无情。沈雁冰强调说,鲁迅板着脸剥露别人的虚伪的

外套而我们并不以为可厌，“就因为他也严格地自己批评自己分析呵”！文章还认为：《呐喊》和《彷徨》中的小说，大都是描写“老中国的儿女”的思想和生活，而这些“老中国的儿女”“我们在今日依然随时随处可以遇见，并且以后一定还会常常遇见”；同时，在“这些‘老中国的儿女’的灵魂上”，还“负着几千年的传统的重担子”。这就肯定了鲁迅小说对旧中国现实生活的真实而深刻的反映，肯定了它鲜明的时代性、民族性与历史的穿透力，肯定了它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尤为可贵的是，沈雁冰在文中还对鲁迅杂文做了开创性的评论研究工作。一方面，他很有见地地揭示了鲁迅的杂文与小说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鲁迅的“杂感能帮助你更加明白小说的意义”，“喜欢读鲁迅的创作小说的人们，不应该不看鲁迅的杂感”；另一方面，他又着重指出了鲁迅杂文本身所具有的强烈的战斗性，认为它充满了反抗的呼声和无情的剥露，“反抗一切的压迫，剥露一切的虚伪”！特别是《热风》里的文章，“大部分是剜剔中华民族的‘国疮’”，而《华盖集》则“除奋勇剜剔毒疮而外，又时有‘岁月已非，毒疮依旧’的新愤慨”。沈雁冰还认为特别难得的是：1924年以后，攻击老中国的“国疮”的声音，几乎只剩下鲁迅一个人的了。“‘寂寞’中间这老头儿的精神，和大部分青年的‘阑珊’，成了很触目的对照。”这些都是很深刻的见解，抓住了鲁迅能够坚持韧性战斗的根本特点。总之，《鲁迅论》全面论述了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强调了鲁迅著作“是指引青年应当如何生活如何行动的”，确认了鲁迅作为中国新文坛的主将的地位。作为作家论很有开创价值。文中虽然引证稍多，但总的来说仍不失为早期鲁迅研究史上的一篇具有重要意义的佳作。

此后，沈雁冰又对鲁迅的历史小说《故事新编》表现了关注。如在为《玄武门之变》所写的序言里，他就从文学史的高度称赞了鲁迅是我国现代历史小说的“伟大的开拓者和成功者”。他认为《故事新编》不仅在形式上以其“多种多样的变化”给我们树立了“可贵的楷模”，而且“尤其重要的，是内容的深刻”。沈雁冰强调